

本 书 由
中山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韩关系史研究/魏志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306 - 02688 - 7

I. 中... II. 魏... III. 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古代 IV. D829. 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583 号

责任编辑: 李海东

封面设计: 大象

责任校对: 何凡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 (020)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 (020) 84111998,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84036565

印 刷 者: 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经 销 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 格: 635mm × 960mm 1/16 17. 125 印张 2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上编 辽金帝国与高丽之关系

第一章 辽丽关系的展开与辽圣宗对高丽的征伐	(13)
第一节 辽丽关系的展开	(13)
第二节 辽对高丽的第一、二次征伐	(15)
第三节 “六城问题”与辽对高丽的第三次征伐	(23)
第二章 1020—1125 年的辽丽关系	(28)
第一节 朝贡关系下辽丽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28)
第二节 渤海大延琳之变前后的辽丽关系	(33)
第三节 大金的崛起与辽、金和高丽的关系	(37)
第三章 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	(44)
第一节 辽宋和战及其对宋丽关系的影响	(44)
第二节 宋丽关系的演变与辽的反应	(47)
第三节 高丽对辽宋“二元”朝贡体制分析	(51)
第四章 金建国前东、西女真及其与高丽的关系	(57)
第一节 东、西女真与高丽的关系	(57)
第二节 高丽向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封疆开拓	(64)
第三节 东女真的海寇问题	(67)

第十一章	清鲜宗藩关系的成立及其演进（下）	（187）
第一节	以沈馆为中心的清鲜交涉	（187）
第二节	助攻皮岛与明清宁锦大战中的朝鲜	（192）
第三节	朝鲜“海上沉粮”与“覆没舟师”	（198）
第四节	关于朝鲜“暗通明朝”的问题	（205）
第五节	1637—1644年清鲜关系的分析	（209）
第十二章	清入关初期清鲜关系的发展——以顺治、 康熙朝为中心	（218）
第一节	清兵入关与清鲜关系的调整	（218）
第二节	朝鲜“反清复明”的战略与“北伐论”	（220）
第三节	清鲜文化关系的重新认同与两国关系的改善	（228）
第四节	清鲜宗藩体制的运作及两国的权利与义务	（235）
结束语	（250）
附录	试论国立中山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	（253）
后 记	（268）

绪 论

中韩两国壤地相接，山水相连，具有三千年的交往史。从公元4世纪开始的中韩宗藩封贡关系，在政治上大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迄唐初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新罗、白济的关系，唐罗关系，宋辽金迄明初与高丽的关系和明清与朝鲜王朝的关系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宋辽金与高丽的关系堪称古代中韩关系的转型时期，即高丽从传统的对中原汉族王朝的朝贡开始演变为对中国北族王朝朝贡的时期。韩国著名学者李丙焘先生即尝谓高丽历史是“与其北方塞外民族的斗争史”（氏著《韩国史大观（中世篇）》，台北正中书局1961年版）。明清与朝鲜的关系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宗藩关系的典范。不论辽金，还是大清帝国，均是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探讨辽金和大清帝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对中韩关系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取名为《中韩关系史研究》，盖缘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多以“三韩”或“韩国”指称整个朝鲜半岛。最早在典籍中将朝鲜半岛称为“韩国”者，当为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其卷三十谓：“桓、灵之末，韩涉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又称：“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东晋南朝范晔撰《后汉书》，其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也谓：“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此即所谓“三韩”。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李成桂以“朝鲜”、“和宁”二国号，请明太祖裁定，朱元璋以“东夷之号，唯朝鲜之称美”，遂赐李成桂国号为“朝鲜”（《李朝太祖康献大王实录》卷二），故《清史稿·朝鲜列传》卷五二六谓：“朝鲜，又称韩国。”高宗光武元年（1897年），朝鲜国王高宗以其

国号具宗藩色彩，不符合近代国家主权平等之意义，遂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现代朝鲜半岛，不论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是大韩民国，其英文名称均为“Korean”（高丽）。本书主要研究辽金和大清帝国前期与朝鲜半岛政权之关系，虽然时间跨度较长，但辽金和大清均为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可自成一北族王朝体系。以北族王朝的视角审视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之关系，也为本书特色之一。故本书书名统冠之以“中韩关系史研究”，似乎也并无不可。

本书由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组成。上编为作者主持的1996年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辽金元：中国北族王朝与高丽关系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亦是作者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撰之博士论文，后又经作者在博士后阶段加以修订和完善而成。上编对辽金时期中韩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扎实的考证与研究，探讨了此一时期高丽从传统的对中原汉族王朝的朝贡演变为对中国北族王朝朝贡的历史进程及中韩关系的时代特征，并揭示了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秩序演进的一般规律。本书下编则是作者在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作博士后研究时之出站报告，主要是对明清萨尔浒之役后朝鲜与大清帝国前期国交的展开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清鲜宗藩关系的成立及其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最后，本书以顺治、康熙朝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了清入关初期清鲜关系的发展历程。指出清入关后，随着其“天朝大国”形态的完成和儒化政治的推行，清鲜两国均审时度势地调整彼此的外交政策，由于清对朝鲜采“字小以仁”的笼络和怀柔政策，清鲜关系进入了较为稳定和谐的典型的宗藩关系的运作轨道。此外，本书下编还结合韩国著名学者全海宗教授对清鲜宗藩关系的研究，对清鲜宗藩关系运作的特征及朝贡品和回赐品的意义，作了扎实的考证和辨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附录部分主要对孙中山及其所创立之国立中山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之关系加以论述，其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史料。

本书上编主要是对辽金帝国与高丽关系的研究。公元10世纪，大唐帝国土崩瓦解，东亚地区再次陷入战乱频仍的时代。

以契丹和女真为代表的辽、金王朝先后取代中原汉族政权——宋朝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中心。由于此一时期东亚大陆局势的变动，在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对大陆的政策亦陷入两难的抉择，并不断面临着调整。围绕朝鲜半岛所展开的辽金与高丽的关系构成了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因而历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韩国对辽金和高丽关系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金在满《契丹高丽关系史研究》（汉城国学资料院1999年版）、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李龙范《高丽与契丹的关系》（韩国檀国大学《东洋学学术会议讲演抄》第6册，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所1976年）、金光洙《高丽前期对女真交涉和北方开拓问题》（同上）、朴汉男《高丽对金外交政策研究》（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金庠基《高丽时代史》（汉城东国文化社1961年版）、卢启铉《高丽外交史》（汉城甲寅出版社1994年版）等。此外，金在满、全海宗、李基白、方东仁、金九镇、朴龙云等学者亦多有专题性论文问世。以上成果大体体现了韩国现阶段对辽金与高丽关系研究的学术水准。日本学术界开展对辽金与高丽关系的研究，应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稻叶岩吉、池内宏、箭内互、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等人，其成果多收录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14册，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出版，1915—1941年）和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1~2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14年版），以及《朝鲜历史地理》（同上1913年版）诸书中，有的成果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上述学者的研究多为若干具体史实的细琐考证，宏观研究不足，因而难以对辽金与高丽关系进行系统的整体认识。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出现了又一批从事此一课题研究水准较高的学者，主要有旗田巍、中村荣孝、森克己和三上次男等。上述学者不再局限于史实的考订，而且研究方法较之二三十年代亦多有创新，即从宏观上将辽金与高丽的关系置于整个东亚史体系进行研究，主要成果多收录于战后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和三上次男《金代社会、

政治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1973 年版)等书中。但作为专论辽金与高丽关系的成果却十分寥寥,殊令人遗憾。

与韩、日诸国的研究比较,中国对辽金与高丽关系的研究尚处于开拓阶段,其成果不论在数量亦或质量上,均有较大之差距。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仅有李符桐、朱希祖诸先生或考辽丽关系之变迁,或列表比定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之关系,洁光片羽,弥足珍贵。5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除了周一良、朴真奭、杨通方、刘迎胜、姜孟山、姜龙范、石源华、金健人、杨渭生、陈尚胜、权赫秀、杨昭全诸先生致力于中韩关系史之研究外,专论辽金与高丽关系之代表性成果,则主要是笔者《辽史·高丽传 考证》(《文献》1996 年第 2 期)、《论 1020—1125 年的辽丽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论十二世纪初金与高丽的外交》(《江海学刊》1998 年第 4 期)和《辽宋丽三国关系与东亚国际秩序》(台北《大陆杂志》1997 年第 94 卷第 3 期)和王新民先生《韩日中交涉史考》(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等。在中国台湾,亦有王仪、王民信、黄宽重诸先生研治辽金与高丽关系史。由于台湾缺乏既懂韩语,又能把握当代韩、日诸国研究动态的专门性人才,故对若干史实疏于考订,研究成果亦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台湾学术界近年来已专门制定了宋辽金元与高丽关系的研究计划,并获得“国科会”的经费资助,表明此一论题之研究亦已受到台湾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本书上编所运用的史料,除了以中国有关正史、政书及文集、笔记、碑铭、方志等为主要依据外,尤注重利用韩国、日本等有关史料和研究成果。此外,还参考了波斯文拉施都丁《史集》中关于“东夏国”的有关记载,并采用审音勘同的方法,对中外文献中的有关人名、地名及名物制度等加以勘正考辩,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外学术界数十年的所谓“东夏”抑或“东真”——蒲鲜万奴的国号问题。

本书下编主要是关于大清帝国前期与朝鲜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清前期的清鲜关系首先应把握清鲜关系的发展历程。然而,迄今为止,除权赫秀教授尝对近代中朝关系的分期

进行研究外（参见氏著《对中朝近代关系史分期的认识》，载《中国朝鲜史研究》第一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学术界少有专文讨论清鲜关系的分期问题。从1619年清（后金）鲜两国正式缔结国交开始，迄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本吞并韩国，两国关系共经历了291年。如果以1876年日鲜《江华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则清代中韩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清鲜典型的宗藩关系形成和运作时期；后期则为清鲜宗藩关系在西方殖民势力和近代条约制度的冲击下趋向解体的时期，也可以称为近代中韩关系时期。不过，在以往有关中韩关系的通史性论述中，对清代中韩关系分期的表述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其一认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应作为划分清鲜关系前、后期的标准（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页）；其二则将19世纪60年代，朝鲜开国，进入近代时期，作为清代中韩关系乃至中韩关系史由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标志〔参见徐万民《中韩关系史》（近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以上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窃以为研判历史上中韩关系的分期，应该从中韩两国本身关系发展的本质差异及其呈现的不同形态特征，并结合当时世界环境的变化来考量。如果这一研判标准能够成立，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英、法等西方列强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近代条约制度并未对传统的中韩宗藩体制构成冲击和影响。19世纪60年代，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丙寅洋扰”和“丁未洋扰”，亦仅仅表明朝鲜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骚扰和冲击，将其作为韩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多无异议，然而分别以韩国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套用于中韩关系史，则似乎令人费解。笔者以1876年日鲜《江华条约》的签订，作为划分清代中韩关系前、后期发展的标志，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江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日本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首次将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条约制度强加于朝鲜，并由此打破以中韩宗藩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从而导致中韩宗藩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第二，朝鲜被迫开国后，清朝为了抵御日本

势力在朝鲜半岛的扩张，一改朝鲜传统的宗藩体制下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开始全面强化对朝鲜内政和外交的干涉，因而，朝鲜宗藩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前的表现形态；第三，《江华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朝鲜传统的宗藩体制的功能、特征及性质发生改变，而且标志着长达近两千年的中韩宗藩关系开始走向解体。因此，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并以此导致朝鲜宗藩关系在本质和形态上都开始发生变化，作为界定清代中韩关系前、后期发展的标志，似乎更为恰当。

由于时间和笔者学识的限制，本书下编并非对有清一代中韩关系进行全面的探讨，而仅仅对清代前期，从1619年清（后金）鲜国交的正式建立到1683年朝鲜两国形成典型的宗藩关系的历程及其内外部因素加以考察，并揭示以中韩宗藩关系为典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

1619—1683年的朝鲜关系，共长达六十四年。虽然，这在近三个世纪的清代中韩关系史上仅占五分之一，但其内容却十分错综复杂。由明清易代所导致的东北亚局势的动荡及朝鲜王朝被迫介入中国的内乱，使朝鲜半岛政权对中国的关系继辽金元之后，再一次陷入了一场极其痛苦而艰难的抉择。明朝灭亡后，朝鲜王朝以“小中华”自居，由于程朱理学的长期熏陶和出于对明朝“壬辰拯济之恩”的感恩心理，朝鲜长时期视后金（清）为“犬羊”、“胡虏”，并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及文化上的自大主义作为指导对清关系的基本理念。因此，尽管“丙子之役”，清太宗皇太极迫使朝鲜国王李倧投降，并签订《南汉山盟约》，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国交，转奉清朝为宗主国，并开始建立朝鲜宗藩封贡体制，但是，朝鲜关系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即使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朝鲜王朝仍谋求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乃至日本联络，试图从事其“反清复明”的战略部署，因而，两国关系在不和谐的基础上曲折地向前发展。直至1683年，清康熙平定台湾，不仅清王朝完成了其“天朝大国”的一统形态，而且，也迫使朝鲜王朝开始客观地看待清王朝的政治地位。清入关后，在文化上极力推崇儒治，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在对外关系上也努力推行儒家以德柔远的礼

治主义政策，对朝鲜王朝亦不断加以笼络和怀柔，施以所谓“字小以仁”。朝鲜王朝在与清朝的长期接触中，尤其是赴清燕行使节与清朝文人士大夫的交往，终于使朝鲜转变对清朝的心态和政策，在所谓“久远仇嫌”理念的支配下，不仅在政治上开始自觉接受清朝的宗主权，在清鲜宗藩体制的规范下，竭尽“事大以诚”，而且在文化上也努力倡导“北学”，表示对清文化的认同。尤其是康熙对朝鲜的赈灾体恤措施，更令朝鲜“举国怵庆”，康熙也因此被誉为“朝鲜皇帝”。至此，清鲜关系方正式结束敌视和互不信任的状态，开始步入典型的宗藩关系的轨道。迄1876年，中韩关系进入近代，清鲜关系一直在典型的宗藩封贡体制的规范下较为顺利和稳定地向前发展。

与中外学术界较多地致力于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近代中韩关系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的研究无疑是较为薄弱的。兹就本书下编所从事的三个专题的研究现状，作一简单的概述如下：

首先，对后金时期，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关系的研究，日本学者稻叶岩吉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光海君时代的满鲜关系》（京城大阪屋书书店1933年版），大体上奠定了此一时期金鲜关系研究的基础。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宗藩关系制度的运作——以朝鲜与努尔哈赤的第一次纠纷为例》（《中国历史论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一文则较早地论述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前夕，明鲜宗藩关系的运作，然对萨尔浒之役后金鲜两国国交的正式展开及金、明、鲜三国关系的整合和发展未作探讨。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亦相继发表了有关此一时期金鲜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白新良《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清史研究》1997年第5期）、徐凯《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3辑，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所撰《清代前期的中朝关系》（《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不过，客观地说，上述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仍未超出30年代日本稻叶岩吉氏的研究水准，甚或对其早已辨析过的错误史料仍照录不误，实令人遗憾。因此，对萨尔浒之役后，金鲜国交的正式展开及明、清（后金）、朝鲜三国关系

的变动，仍需要作出严谨的考订和理论上的说明。

其次，关于丁卯、丙子之役与清鲜宗藩关系的成立的研究，学术界成果则相对较为集中，尤其是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多。如李光涛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即对丁卯、丙子之役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多收录于作者《明清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一书中，是为台湾学者从事清鲜关系研究的开拓之作。张存武先生深受李氏影响，更以毕生精力从事清代中韩关系的研究，其《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则为台湾研究清代中韩关系的力作。此外，陈捷先、刘家驹二先生亦致力于清鲜关系之研究。陈先生不仅对朝鲜笔记史料李民奭的《柵中日记》进行了考订和研究，而且，对丁卯、丙子之役期间，清鲜关系之诸矛盾亦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刘先生的《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则收录了作者系统研究清入关前中韩关系的八篇论文，为中国学术界唯一一部专门从事清入关前中韩关系研究的论文集。中国大陆学者从事此一问题研究的成果，则主要有前述徐凯《论“丁卯虏乱”与“丙子胡乱”》和晁中辰《满清入关前与李氏朝鲜的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徐文主要从皇太极两次对朝鲜用兵的战略角度进行考察，然而，却忽略了《满文老档》中有关朝鲜叛投后金的将官对皇太极制定征伐朝鲜战略的影响；晁文则将清入关前与朝鲜王朝的关系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述，揭示了清鲜两国由“兄弟之国”到宗藩关系缔结的经过，但其将满清入关作为清鲜不和谐关系的结束，似仍需加以商榷。此外，李善洪亦撰有《试论毛文龙与朝鲜的关系》（《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对毛文龙在朝鲜的活动及其对清鲜关系的影响均作了论述。韩国、日本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韩国较早从事清鲜“丁卯虏乱”研究的学者当首推全海宗教授，其论文《有关丁卯胡乱的和平交涉与朝清朝贡关系的开始》（载氏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清鲜丁卯之役及“江都之盟”作了精辟的考述。唯“丁卯胡乱”，清鲜两国结成的“兄弟之盟”系平等性质，并

非朝贡关系，然全先生将其视为清鲜朝贡关系的开始，则似欠允当。此外，日本学者专论清鲜宗藩关系成立的成果，主要是鸳渊一《清代初期的清鲜关系和三田渡碑文》（原文为日文，载《史林》1927年第13卷1、4号），该文着重探讨所谓“丙子虏祸”的结果即三田渡盟约的订立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由于“丁卯胡乱”与“丙子虏祸”为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之重要事件，故研究相对较为集中，成果亦较多。

最后，由于学术界多将1644年清兵入关作为清鲜宗藩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故对清入关后迄1876年中韩关系进入近代，中外学者的研究多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探讨清鲜宗藩关系的结构、功能及其性质、特征等，尤其是对宗藩关系规范下朝贡贸易的研究较为深入，而对顺治、康熙时期清鲜关系向典型的宗藩关系转变却缺少论述。对清鲜宗藩体制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则为台湾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1637—189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第39辑，1978年6月）和韩国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载氏著前揭书，第181~242页）等。张著对清韩宗藩关系之建立及其规则，作为宗藩关系维系和运作机制的清韩间使行贸易，边境开市及宗藩贸易的功能均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则为作者1965年9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召开的“中国的世界秩序”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英文稿载J. K. Fairbank所编的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1968年）一书。由于该文以韩文刊载于韩国《震檀学报》卷29、卷30（1960年12月），并收入作者《韩中关系史研究》（一潮阁1970年初版，1986年再版）及《中韩关系史论集》（中译本，同前揭书），故具有较广泛的学术影响。该文除考察宗藩关系的运作及其制度性特征外，还运用朝鲜正祖、纯祖时期物价比值的资料，对朝贡品和清的回赐品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皇帝赠赐朝鲜国王及其家族的物品价值同朝鲜交纳中国的岁币和方物相比，前者不及后者十分之一”（参见氏著前揭书，第210页）的结论，并认为清韩间“典型的朝贡关系，不仅没有给朝鲜带来经济利益，反而造成莫大损失的事实”（同上，第228页）。随着近年来，韩国、日本学术界对朝贡关

系研究的深入，中国学术界传统的所谓“厚往薄来”说已越来越遭受质疑和挑战[参见拙文《中韩关系史研究的扛鼎之作——（韩）全海宗 中韩关系史论集 中译本评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此外，张存武还撰有《清韩封贡关系之制度性分析》（载氏著前掲书）一文，从法权与政治、司法、军事与涉外关系及权力、义务的限度等方面对清鲜宗藩体制作了全面分析。我国大陆学者近年对清鲜宗藩体制的研究，其代表性成果主要为陈潮《传统的华夷国际秩序与中韩宗藩关系》（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明清之际的中韩宗藩关系》（《学术论坛》1997年第1期），两文内容虽较为一致，然为笔者近年来仅见的我国大陆学者对清代中韩宗藩体制研究的力作，值得重视。

鉴于近年来张存武、滨下武志、全海宗等中外学人对清鲜宗藩体制及其运作，尤其是朝贡贸易等方面，已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清入关后清鲜关系的互动演变却少有人问津的现状，同时，为避免人云亦云，本书下编第十二章将着重从清鲜两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和朝鲜由被迫到自觉接受清在朝鲜半岛的宗主权，以及对清文化的认同等方面，对清鲜两国步入典型的宗藩关系轨道的历程及其内外部因素加以考察和分析，以弥补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不足。至于清代中韩宗藩体制的性质、影响、历史地位及其与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区别，则在本书的结束语中略作理论上的分析，正文中不再列出专题加以讨论。

此外，本书附录部分收录了笔者与徐瑶同志合作撰写的《试论国立中山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一文，运用大量的档案资料，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时期，在中国南部的广东中山大学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弥补了中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不足，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中山大学实际上已经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人才养成基地和在中国南部的独立运动的中心。

上 编

辽金帝国与高丽之关系

第一章 辽丽关系的展开与辽圣宗对高丽的征伐

唐天祐四年（907年），大唐帝国土崩瓦解。中国中原地区先后形成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南方则出现南唐、吴越、蜀、荆南、南汉等割据政权。在中原局势动荡、干戈纷扰之际，崛起于东北潢水流域的契丹族乘机南下侵扰中原。契丹神册元年（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后改称辽）并西征漠北，东灭渤海，势力急剧扩张。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臣和割让燕云十六州的代价向契丹乞援，并自称“儿皇帝”，从而引契丹势力南下。至此，契丹势力深入农耕经济发达的燕云地区。宋建隆元年（960年），宋朝建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辽宋遂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所谓“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俨然敌国。……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1〕}。在韩半岛，后梁贞明四年（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发动政变，建立高丽王朝，史称王氏高丽，东亚国际秩序遂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辽与高丽的关系即在此背景下展开。

第一节 辽丽关系的展开

辽对高丽的交涉始于天赞元年（922年）。《高丽史》载：是年“春二月，契丹来遣橐驼、马及毡”^{〔2〕}。高丽亦遣使报聘，辽丽两国开始建立起平等的睦邻关系。然而，天显元年（926年），契丹灭渤海国，“得地五千里，有兵数十万，兼领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抚其众，契丹益大”^{〔3〕}。由于渤海、高丽